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云南各民族团结抗战 谱写御侮的英雄壮歌

朱强

抗日战争是一场决定民族存亡的战争，也是一次深刻的民族精神洗礼。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从“边疆”转变为支撑全国抗战的“后方”与国际通道前沿。面对民族危机，云南各族人民以高度的爱国情怀投身救亡洪流，彝、白、哈尼、傣等二十

多个民族的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团结御侮的英雄壮歌。这场战争不仅抵御了外来侵略，更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淬炼和升华了云南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滋养与精神财富。

共赴国难 血染疆场的家国认同

抗战爆发后，云南各族儿女积极响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掀起参军热潮。据统计，彝、白、哈尼、纳西等各族人民子弟共计37万余人投身军旅，共赴国难。他们被编入滇军，转战湖南、湖北、山东等地的正面战场，在一次次与日军的殊死搏斗中，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滇军的赫赫威名。

在惨烈的战争中，滇军将士伤亡超过十万人，立下不朽功勋。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少数民族将领和士兵。其中，彝族将领张冲便是杰出代表。出生于云南泸西的张冲，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中，担任滇军60军184师师长。他临危受命，指挥部队在禹王山一线浴血阻击，面对日军精锐的疯狂进攻，死守阵地，寸土不让，为整个战役取得最终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张冲因其卓越的战功被擢升为新三军军长，随后又率部参加了规模宏大的武汉保卫战，再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张冲的戎马生涯，正是云南各族儿女共赴国难的缩影。在并肩作战的血火洗礼中，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

同心支撑 共担责任的国民意识

战争不仅是前线的军事较量，更是后方综合实力的持久比拼。作为抗战的重要战略后方，云南肩负起支撑长期抗战的重任。各族儿女不仅踊跃送子弟参军，更以坚初的意志与无私的奉献，在后方筑起了维系国家命脉的“生命线”。正是在这样的共同奋斗与付出中，云南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奇迹之路：滇缅公路的修筑。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打破封锁、获取国际援助，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从昆明至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面对横断山脉的险峻地形与极其有限的技术条件，云南各族儿女二十万人挺身而出，自带工具、口粮，以血肉之躯劈山架桥，夜以继日奋战在崇山峻岭之间。仅用不到九个月，这条长达959公里的“生命线”便全线通车，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滇缅公路的修筑，不仅是一项工程壮举，更是云南各族人民用汗水、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团结丰碑。在共同建设“抗战输血管”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为了救国目标并肩奋斗，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认



同，凝聚起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马帮古道的新使命：滇西驿运。抗战期间，为保障物资输送，云南开辟了滇西马帮驿运。拥有悠久马帮传统的回族同胞承担起这一重任，其人员占比高达约95%。这些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的马帮，如同维系抗战命脉的流动血液，为前线注入了宝贵的生命力。

此外，云南各族人民还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如积极购买救国公债、踊跃捐款捐物、组织劳军活动等。这种全方位的、全民性的参与，使得抗战成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一种抽象的理念，转变为具体、生动、可感的社会实践。

寸土必争 滇西抗战中的民族自卫

1942年5月，日军在侵占缅甸北部后，继续入侵云南西部，怒江以西大片

国土沦陷，云南从抗战“大后方”变为抗战的“最前线”。家园被毁，同胞被戮，激发了滇西各族儿女“保家”即“卫国”的战斗意志。汉、傣、景颇、德昂、傈僳、佤、拉祜、布朗等各族民众，自发或有组织地投入到守土抗战之中。

在日军入侵的危难时刻，云南各民族摒弃历史隔阂，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德昂族民众持铜炮枪、长刀等传统武器组织游击队，在丛林中神出鬼没地袭扰日军；景颇族成立“抗日自卫游击中队”，依托地形优势，在广阔区域开展机动游击，有效牵制敌军。在阿佤山区，佤、拉祜、傣等民族联合成立抗日联防协会，并组建“耿马沧源支队”“班洪自卫队”等多支武装，在各区域构筑起坚固的民众防线。

1943年初，日军进犯西双版纳，当地傣族等各族人民团结抵抗，将敌军击退至打洛江以南并长期固守江防。在澜沧边境，拉祜、佤、傣等族群通过阻断交通、开展游击等方式有效抗击日军；中越、中老边境的哈尼、彝、壮等多民族民众，则共同构筑了长达183公里的防

御工事，展现守土决心。

这场本土抗战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各族群众不仅直接参战，还承担侦察、运输、救护等关键任务。在并肩作战中，民族联系空前紧密，家园与国家的命运深刻交融。

绝地反攻 军民一体走向最终胜利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对峙与准备，1944年5月，滇西抗战迎来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向盘踞在滇西的日军发起全面反击。在松山战役、腾冲战役、龙陵战役等一系列关键战役中，滇西各族民众与远征军紧密配合，形成了军民一体的强大合力，为最终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抗战反攻准备期间，云南各民族上层人士展现出崇高民族大义，积极投身组织动员。例如，年近八旬的六库白族老土司段浩，挺身组建“福（贡）碧（江）泸（水）练（地）自卫支队”，后改编为运输第40团，专司前线后勤保障。无论在江防坚守还是反攻阶段，该队伍均全力为远征军输送弹药和给养，成为重要支撑力量。这些爱国行动，有力鼓舞了民众抗战士气。

各族人民为抗战提供了全方位支援：担任向导引路，组成担架队抢救伤员、侦察传递情报、修复道路桥梁，甚至在腾冲战役中协助制造攻城器械。这种军民一体、生死与共的关系，成为滇西反攻胜利的重要保障。

回顾云南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峥嵘岁月，从参军血战到策略支前，各族儿女以牺牲与团结铸就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抗战的胜利不仅属于军事，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凝聚，它打破了地域与族群的隔阂，将云南各族人民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应珍视民族团结，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凝聚各族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烽火岁月中的绿色火种 ——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林业高等教育

柏顺文

1939年深秋昆明，空袭警报嘶鸣，云南大学森林学系的师生们收起图表躲进防空洞，警报一解除便回到茅草棚继续授课。这颗战火中的绿色火种，在滇云大地上顽强燃烧，开启了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

烽火建校 国难中的林业教育萌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多所高校内迁。1938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增设农学院，次年又创办森林学系，开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双重使命。

首任系主任张海涛受邀返滇筹建森林学系。面对战时木材需求迫切、云南森林资源丰富的现实，他将系址设于呈贡，既避轰炸又便于“加强学生的社会实习，促进农村建设”。师生改造祠堂为教室，用土坯垒砌实验室，借煤油灯备课阅卷，条件虽然艰苦，仍坚持延聘多位全国知名林学家，形成“战时学术共同体”。

课程设置紧密呼应战时需求，并增设特种用材林培育、木材防腐等技术科目，并在呈贡农场、昆明厂口设实验林场或实习林场。师生参与酒精原料生产、滇缅铁路枕木林规划等抗战项目，实现学术与实务的结合。

农学院还附设农民子弟学校，免费招收农村儿童，由家境清寒而学业成绩较好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最多时学生达160余人。1940年呈贡遭空袭，标本室被毁，师生抢救残存资料，转至村庄坚持教学，战时仍培养出一批急需的林业专才。

学术突围 艰难环境中的知识创新

抗战期间，云南大学森林学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托云南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取得了多项开创性学术成果，为中国现代林学发展奠定基础。

植物分类学成就尤为突出。秦仁昌率团队深入滇西、滇南原始森林采集标本，并于1940年发表《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提出将水龙骨科划分为30多科、200多属的新体系。该分类动摇了国际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体系，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同时，森林学系郑万钧的树木学、徐永椿的标本室建设、薛纪如对水杉的发现与研究等，均取得重要进展。至1943年，森林学系已开展林木种子发芽、桉树油提炼等多个科研项目。

学术交流在战火中持续。森林学系举办多场农林专题讲座，如《云南食用菌类之研究》《云南稻作问题》《云南果

品之产销问题》等，并凭借学者人脉获取外地学术资料。1943年，更成功承办中国林学会西南分会年会，汇聚川、黔、滇等地林学同仁共商战时林业对策。

学生培养坚持“少而精”。1937年到1945年期间，累计毕业生不足百人，学生多来自云南及周边省份，怀揣科学救国理想，在校期间既完成繁重学业，也参与战地服务与野外实习。师生常年徒步深入滇中、滇西、滇南林区调查，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式，锤炼出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与深厚的行业热情。

薪火相传 从战时学系到现代大学

抗战时期，森林学系已有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活动。教师曹诚一、学生杨泓光等人在完成科研与学业的同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抗战后期，杨泓光更在滇黔边境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成为云南大学最早深入农村开展革命工作的学生之一。

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农学院于1946年迁回昆明，张海涛等学者持续推进学科建设，增设木材学、森林保护学等课程，扩大招生规模，那段烽火岁月凝聚的“扎根边疆、服务林业、艰苦创业、追求卓越”的精神，成为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宝贵财富。

清代云南试律诗漫谈

陈圣争

试律诗（试律），通常又称之为试帖诗（试帖），又有试体诗、馆体诗、馆课诗、应试诗、应制诗等诸多异名。它起源于唐代科举考试，元代科举废除诗赋后，试律诗一度中断近四个半世纪，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会试与二十四年（1759）乡试中才重新被纳入科举，并规定以五言八韵排律为主要体裁。在制度推动下，清代中后期科举逐渐形成“八股取士”与“诗赋取士”并重的局面。此后，试律诗进一步推广至童试（五言六韵）、岁科考、各类贡生考试、朝考、散馆及翰詹大考等广泛场合，其应用范围甚至超过八股文。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甘肃、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五省的乡试中仍可见其影响。

云南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乡试起加入试律诗，首科诗题为《赋得“行不由径”得“行”字五言八韵》。从1759年至1901年，全国共举行67科乡试，云南因战乱停考6次，实考61科。每科应试者约3000至4000人，累计约有18万至24万人参与乡试并创作试律诗。这一庞大作品若得完整保存，堪称云南文学与文化之丰碑。然现存试卷多为中举者所刻，落榜者诗作几无传世，历史记载因而有所偏重。

据《大清会典》记载：云南乡试，规定取中正榜（举人）54名、副榜（副举）10名。不过，不少科份的乡试实际录取正榜人数是超员的：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科、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等科份皆取中64名举人；尤其是个别科份带补停科时，其取中人数更是成倍地增加，如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因为带补咸丰八年（1858）戊午正科、咸丰九年（1859）己未恩科，三科并考，取中正榜人数为162人；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并补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取中正榜人数为118人；等等。即以额定正、副榜人数而言，自乾隆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十七年间，也有4000多份举人、副举的试卷刻印流传，意味着亦有4000多首试律诗作。遗憾的是，这些乡试试律诗亦没有完整保存，甚至十不存一，故而，得以保存者亦弥足珍贵，这是云南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若能充分运用，对于地方文化建设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61次云南乡试中，有三科乡试诗题得句与云南地方景物和历史文化相关——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诗题得句为“彩云见”（出自唐人张说《贺京兆尹见状》，明人谢肇淛《滇略》亦有载）、同治九年（1870）庚午科诗题得句“海色澄清映南极”（出自元好问《刘时举节制云南》）、光绪十一年（1885）

乙酉科诗题得句“金沙万里走波澜”（出自明末清初云南丽江府土知府木靖《雪山》），幸而后两科还保留着数十首诗作。在这些诗作中，云南境内的滇池（或泛称滇海）、苍山、洱海、丽水、雪山、金沙江、澜沧江等自然景观与碧鸡、金马、铜柱、六诏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较为集中地涌现。略举一二诗例为示，如同治庚午科解元杨高德与光绪乙酉科解元寇仲衡二人之诗分别写道：

赋得海色澄清映南极得清字五言八韵 杨高德 第1名 大理府太和县
万古滇池水，澄来一色清。海浮南极远，星拱北辰明。寿耜三台接，烟霞六诏平。金波寒有影，银汉寂无声。华清秋横练，澜沧夜洗兵。光分牛斗近，气敛蜃楼轻。揽镜看冠冕，临流壮旌旌。遣山留好句，帝治岂由庚。

赋得金沙万里走波澜得澜字五言八韵 寇仲衡 第1名 云南府
万里开荒服，金沙望渺漫。层波环玉垒，一气走银澜。浪直乘风破，山余积雪寒。地遥连鹤拓，江涌注龙盘。远泻长流急，狂趋峭壁难。宝光腾丽水，映影落青峦。夏向梁州控，秋涛洱海宽。朝宗归紫极，带砺莫如难。

在这两首诗中，除了遵循一般的试律诗写作要求外，在字词的选择和意象的使用上，云南元素扑面而来。在国家级考试中，这些有着强烈的云南色彩的词汇及其展现的地域文化特色，对推介云南文化有着一定的功绩和影响力。

同时，在试律诗盛行后的150来年，清代文士出于个人兴趣、教育子弟、朋辈应酬等原因，在非考试场合也写下了大量的试律诗作或诗集。云南文士也贡献了一份云南力量，彰显了云南特色。举其大端而言，如嘉道间“五华五子”之一的呈贡人戴淳，著有《啸竹轩试帖》一卷；同治庚午科解元杨高德，著有《竹溪试帖约刊》一书；其他如昆明谢琼《试帖诗钞》四卷，昆明罗宙《绿杉野屋试帖》一卷等等。晚清著名诗评家朱庭珍对杨高德试律诗极为推崇，认为“其运法严而密，其行气雄而浑……如画家写生，尤多妙境”。

在清代文士试律诗集中，有一类专题试律诗集较为特殊。此类诗集始于嘉庆年间蔡文所撰的《阴鹭文试帖》，而云南地区则以昆明萧培元《二十四孝弟试帖》最为著名。此书初刻于同治七年（1868），光绪年间多次重刊，流传颇广，对后世如华世熙、余廷燧等人的创作亦有影响。此类著作对人心教化与社会和谐具有持久意义，至今仍有传扬之价值。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风土与文明：从秘境咖啡品文化深意

陈德新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自南向北，蕴藏着原始而珍稀的沃土，实为天赐之咖啡秘境。此番论断，非浮夸之辞，乃是一位耄耋之年、深耕云南咖啡研究之行者，历经实地考察后的真切心声。余之足迹，曾至咖啡祖母之地埃塞俄比亚的曼奇拉森林，亦访亚洲印尼黄金曼特宁咖啡产区；从中美哥伦比亚的广袤庄园，到彩云之南的高原咖啡园，四海之内的精品咖啡生态，大抵已有领略。诸多共性，暂且不表。然怒江泸水大峡谷之独绝，实难仿效：其森林蒸腾之气与峡谷聚热之效相融相生；万年火山灰积蕴之富硒土壤，更有云霏、润雨与阴霖三者交替呈现，如天地呼吸，自成节律。

今年9月，我到访泸水市咖啡办公室，主人以一杯手冲怒江咖啡相迎。初接此盏，我本以寻常待之，不料杯环近唇之际，一股温润香气倏然沁入心脾，恍若雨后森林的清新吐纳。轻嗅细品，但觉韵流转，似有坚果与谷物的醇厚底蕴，其间又透出橘皮般的清浅酸意，诸味交织而归于平衡。这般澄澈醇和之韵，令我顿生惊觉，如入陶然之境。此番体验，不仅重塑了我对卡蒂姆品种的固有认知，更印证了风土之力的玄妙——纵是寻常品类，若能植根适宜海拔与独特生态，亦能孕育出精品咖啡豆。

怒江泸水，坐拥北纬25至26.5度之间，其地蕴藏着千万年造化所产生的富硒火山灰质土壤，更妙者，此间光热雨露仿佛天地共谋，时序天成：破晓时分，晨光为咖啡树披上温暖的金缕衣；日过中天，则有流云如瀑，为山峦覆上清凉的薄纱；及至深夜，高海拔的寒凉便为万物覆上冷被，助其植根呼吸。如此精妙的自然节律，无怪乎被誉为孕育精品咖啡的天成之地。

世人皆知，优质阿拉比卡咖啡生于高海拔之域，海拔愈高，昼夜温差愈显，果实成熟期愈长，风味物质得以从容积淀，此乃天成之理。然若论风土之精微，

则如葡萄之与佳酿，咖啡之韵，深系于其生长之地理玄机与处理之法。于怒江泸水，其地不仅占据高海拔之利，更独享“四千”之优势：海拔、日照、雨量、负氧离子过千，呈得天独厚之象。纵有疑虑其热量者，亦不足为忧：巍巍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夹峙三百里峡谷，湿热气流回旋不绝，怒江激流更添磅礴水汽，广袤热量充盈之生境。截至2025年，泸水市咖啡种植面积已突破6万亩。在2024至2025年季，咖啡产量达到约1549吨，实现农业产值7435万余元，成功带动1.13万群众增收，户均增收2.68万元。所植品种主要为瑰夏、铁皮卡、黄波旁等系列精品咖啡，优质咖啡品种种植面积达4.98万亩，良种覆盖率为83%。

此番泸水之行，深感此地生物多样性与精品咖啡种植相得益彰，宛若天成，不禁暗叹缘何今日方至，颇有相见恨晚之憾。9月13日，我们行至连通怒江、保山、大理3州（市）的交通枢纽。立于桥东，遥望西向中龙塘，但见泸水毛毛山一带峰峦叠翠，碧草连天，视野辽阔而景致分明，山环水绕，气韵生动。此情此景，豁然开朗——此地岂非天造地设，堪为世界咖啡博览园之绝佳选址乎？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漫步丽江古城时，一句“云南咖啡还是代表着中国的”，言简意赅，却为这片土地上的咖啡产业注入了深沉的时代注脚。此中深意，远不止于产量与规模的优势。云南咖啡的崛起，实为新中国建设史上党政军民同心共筑的缩影，如今，咖啡已从“舶来品”转变为扎根华夏风土的民族品牌。

世界咖啡看东方，中国咖啡看云南。今日云南咖啡之美，既是山水的馈赠，更是文化自信的味觉宣言。

（作者系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首任秘书长）



怒江秘境 本报通讯员 瞿学峰 摄